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南方经济



- 市场化、南北差距及其根源
——基于作物性质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一举两得”抑或“得不偿失”？
——基于缴费遵从度与基金可持续的视角
- 出口机会与进口竞争对工业机器人企业的叠加影响：
基于出口持续时间的视角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国家级孵化器“认证”效应的实证研究

2022.1

总第三八八期

南方经济

二〇二二年第一期

总第三八八期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经济学会 主办

南方经济

2022年第 1 期(总第 388 期)

名誉社长 钟阳胜

社长 罗必良

主编 王珺

副主编 向晓梅

执行主编 雷比璐

执行副主编 万陆

总校对 刘浩东

出版日期 每月 25 日出版

创刊时间 1983 年

国内外公开发行人



投稿网址: www.scje.org
微信公众号: SCJEQK
邮箱: nanfangjingji@126.com

宏观研究

- 1 市场化、南北差距及其根源
——基于作物性质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丛胜美 耿鹏鹏 罗必良
- 19 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一举两得”抑或
“得不偿失”?
——基于缴费遵从度与基金可持续的视角
曾 益 姚 金
- 35 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兼论金融的调节作用
樊光义 张协奎

开放经济

- 56 外资准入如何影响中国相邻城市间生产率差距?
宋颜群 胡浩然
- 78 出口机会与进口竞争对工业机器人企业的
叠加影响:基于出口持续时间的视角
赵伟康 綦建红

创新创业

- 97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国家级孵化器“认证”
效应的实证研究
孙启新 刘承翊 陈思岑
- 115 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基金政策扩散研究
——基于全国 31 省数据的事件史分析
程聪慧 褚清清

CONTENTS

Macro Economy

- 1Marketization , the North–South Gap and its Root Causes ;
Investig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Based on the Nature of Crop
Cong Shengmei Geng Pengpeng Luo Biliang
- 19Reducing the Pension Insurance Contribution Rate ;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or “The Gains Outweigh the Losses”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ayment Compliance and Fund Sustainability
Zeng Yi Yao Jin
- 35Real Estate Market Reform and Re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Regulating
Role of Finance
Fan Guangyi Zhang Xiekui

Open Economy

- 56How does Foreign Capital Access Affect the Productivity Gap Between
China’s Neighboring Cities?
Song Yanqun Hu Haoran
- 78The Superposition Effect of Export Opportunity and Import Competition on
Industrial Robot Enterprises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xport Duration
Zhao Weikang Qi Jianhong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 97Identifica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ertification Effect of National Incubators
Sun Qixin Liu Chengyi Chen Sicen
- 115Research on the Diffusion of Venture Capital Governmental Guiding Fund Policies ;
Event History Analysis Based on 31 Provinces’ Data of China
Cheng Conghui Chu Qingqing



刊物名称：《南方经济》
出版单位：南方经济杂志社
主管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经济学会
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618号
邮 编：510635
电话（传真）：020-38869851 83642791
出版日期：每月25日出版
美 编：明镜
印 刷：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定 价：15.00元
网 址：www.scje.org
邮 箱：nanfangjingji@126.com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6249
国内统一刊号：CN44-1068/F
邮发代码：46-335
国内总发行：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市场化、南北差距及其根源 ——基于作物性质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丛胜美 耿鹏鹏 罗必良*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根源,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其中,市场化发育的区域差异是解释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线索。然而,市场发育区域差异的生成根源却未能得到恰当的处理与阐释。文章试图从作物性质的政治经济学维度,构建“政府管制—作物性质—逃避策略”的逻辑框架,探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背后市场发育的决定机理。文章认为,如果将市场化进程视为政府管制放松的过程,那么管制放松就可以区分为主动管制放松与被动管制放松。由可实施逃避策略所决定的被动管制放松及其所触发的市场化进程往往具有不可逆性。由此,逃避策略选择的区域差异性,将导致区域市场化发育程度的不同进而带来经济增长的差异。基于全国 1997—2016 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由“无政府主义”的作物种植所表达的管制逃避策略,能够显著促进市场化的发育程度;作物种植差异及其所蕴含的种植文化特性,共同决定了南北市场化差异;源于 2013 年全面开展的农地确权,进一步强化“南强北弱”的管制逃避,导致南北经济差异不断扩大。本研究有助于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提供新的洞见,从而为缓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并推进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关键词:政府管制 作物性质 逃避策略 市场发育 南北经济差距

DOI:10.19592/j.cnki.scje.391812

JEL 分类号:P21,P25,Q18 中图分类号:F30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22)01-001-18

一、引言

探寻经济增长及其差异的根源,是经济学界长盛不衰的话题。从国别的贫富差距(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到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Lee et al.,2012),均受到了广泛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区域经济差距是发展不平衡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孙志燕、侯永志,2019)。尽管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近年来趋于收敛,但南北区域差距自 2013 年来越发突出(盛来运等,2018),已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2019)。

* 丛胜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E-mail:congshengmei@163.com,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 901,邮编:510642;耿鹏鹏,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ail:gengpp0304@163.com;罗必良(通讯作者),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E-mail:luobl@scau.edu.cn。作者文责自负。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933004)。

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分化的态势,已有大量文献分别从资源禀赋、要素流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以及管理者才能等多个维度进行了讨论(邓仲良、张可云,2020)。关于中国南北经济差距形成与扩大的原因,主流文献大体分为三类:一是“系统论”,认为南北经济差距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工业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市场发育程度、地理位置、国家政策、经济体制、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技术创新、资源配置、金融体系、商业文化和新兴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郭妍、张立光,2018)。二是“主因论”,认为影响南北差距的因素具有层次性,并从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中筛选出要素、结构、制度等关键性因素(盛来运等,2018)。三是“匹配论”,认为要素结构与产业关联、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市场规模与产业选择三个方面的匹配机制,是决定经济增长空间分异的根源(邓仲良、张可云,2020)。杨明洪等(2021)的最新研究则认为,南北地区在区域政策环境、贸易开放环境、人居生态环境、产业载体、投资载体和科技载体等方面的异质性与动能转换的差异,是南北差距的重要根源。上述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不同方面深入理解南北经济差距问题。

事实上,上述关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市场规模及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分析,与其说是决定区域经济差距的根源,还不如说是市场化不同发育水平的结果(樊纲等,2011)。关于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发展及区域差距形成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不仅成为主流文献讨论的核心话题,而且达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研究表明,市场化改革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樊纲等,2011;赵恢林,2019)。但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一方面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Brandt and Rawski,2008),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重要反差。从这个层面来说,可以认为市场化发育是一把双刃剑(钱金保,2020)。卢现祥、王素素(2021)的研究表明,2005-2018年东部与西部市场化指数的差距从0.055扩大到0.130,增幅为136.41%;南方和北方市场化指数的差距则由0.012扩大到0.031,增幅为170.69%。与之对应,东部地区占全国GDP比重由54.81%下降至52.41%,西部由17.08%上升至20.05%;南方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由57.35%提高到61.52%,北方则从42.65%下降为38.48%。可见,无论是市场化水平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东西差距均有所收敛,而南北差距则有扩大的趋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新的现象^①。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如果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市场化发育不平衡的结果,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市场化发育的区域差异?或者说,在国家宏观体制一致的背景下,导致区域市场化发育差异的根源是什么?因此,理解我国南北经济差距尤其是2013年之后差距扩大的新问题,必须进一步寻找市场化发育不平衡的内生性根源。

市场化进程在本质上是政府管制的逐步放松(张曙光、赵农,2000),对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如同市场化的双刃剑效应,政府管制也存在类似特征。一方面,促进市场化发育并不意味着管制的彻底消除。在转型经济中,垄断、负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现象始终存在,需要通过政府管制予以矫正(陈富良,2001)。另一方面,政府管制也并非永久

^①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区域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海南,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内蒙、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另外,参考有关文献(杨明洪等,2021),南方地区包括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福建、广东、海南、西藏16省(区、市),北方地区则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山西、陕西、青海、山东、河南15省(区、市)。本文后文的区域划分均以此为据。

有效。随着产业间替代竞争加剧、技术创新、经济条件的变化,固有的政府管制也会导致政府失灵,需要通过放松管制来解决上述问题。对经济发展而言,市场和政府两个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

不同的管制放松将导致市场化发育的不同路径。管制放松存在两种不同的逻辑:一是主动放松。由于管制是有成本的,因此政府管制策略的选择,也遵循成本效益的核算逻辑(陈富良,2001)。假定不存在管制制度的路径依赖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North,1990),当管制放松增加的净收益大于管制实施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寻租活动及租金耗散),政府就具有放松管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市场化程度将由此提升;二是被动放松。如果主动放松没有发生,当被管制者能够发现其潜在收益机会时,管制者和被管制者的博弈就出现了。一旦被管制者选择并实施逃避管制的策略,而管制者不仅因过高的监督成本及实施成本,而且因为管制的不可实施而难以抑制其逃避行为时,管制者将不得不放松管制。这类被动的管制放松,也将提升市场化程度。对于第一类情形,政府管制的主动放松,是基于管制实施的经济有效性而言的,存在管制强化与放松的可逆性,由此带来的预期不确定性并不足以保证市场化的稳定发育。与之不同,第二类情形的管制放松不仅仅是政府基于经济核算的结果,更是因为管制的不可实施性所决定的,由此所诱发的市场化进程则是不可逆的,从而能够表达市场化的内生逻辑。

以谷物等实物的形式征收农业税赋是历史上众多国家维护统治的核心手段,而监督作物种植及其产出物则往往是政府进行管制的重要方式^①。Scott(2017)开创性地从作物种植的角度讨论了农民逃避管制的“艺术”。他按照“政治”标准将作物分类为“无政府主义作物”和“集权主义作物”。作为“集权主义作物”的稻麦,具有看得见、可分割、可估算、可储存、可运输等技术特性,且其季节性特征与财政需求的可计划性高度契合,使其便于作为“征税单位”而受到国家的青睐;而作为“无政府主义作物”的马铃薯、树薯等,既不利于产量监督,也不便于运输储存,隐含着作为税收单位的高昂征收成本。因此,逻辑上可以推断,选择种植结构的“非谷物化”或“无政府主义作物”可以视为一种“管制逃避”的策略。显然,地域与环境的不同、资源及农艺禀赋的不同,尤其是商业意识的不同,一定会导致逃避策略的选择性差异。

鉴于作物的性质差异能够表达管制、逃避及其市场化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本文试图通过构建“政府管制-作物性质-逃避策略”的分析框架,揭示市场化发育及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生成根源。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将政府管制、市场化发育与区域经济差距结合,有助于深化对经济增长根源的机理认识,并丰富相关的研究文献;第二,鉴于市场化与经济关联性的相互关联性,从市场化发育程度来揭示区域经济差距的成因,往往存在严重的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借助作物种植因素能够有助于识别因果关系;第三,阐明农耕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农业的种植结构不仅表达了气候、地理与技术的含义,而且能够表达广泛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其中,作物品种的种植选择隐含着重要的“政治”意蕴,由地理条件及其种植文化所表达的制度遗产,对经济发展有着路径依赖的基础性意义。

^①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作物分别使用“谷物”“块根类(主要是薯类)”“豆类(不含大豆)”以及“油料作物”等分类指标。中国官方统计的粮食作物则包括谷物、豆类(主要是大豆)、薯类(甘薯和马铃薯,不包含木薯和芋头)。本文使用的“谷物”(集权主义的)主要指稻谷、小麦、玉米三类作物。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除引言外,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重点是基于谷物种植的“国家理论”,通过主动管制放松与被动管制放松两类路径的识别,阐明作物性质差异与管制逃避策略所决定的市场化发育的内在机理,提出中国作物种植的区域差异及其逻辑推论;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以及计量模型选择;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集中讨论谷物种植对市场化发育差异的影响;第五部分进一步讨论“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及南北文化差异将如何决定南北经济差距,并对 2013 年以来南北经济差距加剧扩大的原因从产权角度做出可能性解释;第六部分是结论与讨论。

二、作物种植、管制放松与市场化发育机理

(一) 作物种植的国家理论

众所周知,在农业革命之前,智人部落过着被称为“原始的富足”狩猎采集生活。当时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小部落里,部落则会随着环境和资源的变化而不断迁徙。而这一切在大约 1 万年前全然改观,智人开始投入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动植物的生命,由此发生了一场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农业革命。

值得重视的是源于农业革命的“国家理论”。著名人类学家 Scott(2009,2017)的“农庄效应”模型,从谷物种植的视角为人们提供一个关于国家理论的历史认知。由第一次农业革命带来的谷物栽培与家畜驯养,农业与定居社群的结合促成了国家的形成,并进一步加剧了“相互强化过程”。一方面,农耕模式为国家聚集人口与剩余物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国家也凭借其强制与暴力推广农耕与定居。由于谷物构成了国家财政的基础,所以 Scott 认为“谷物造就国家”。其中,因谷物作为征税单位不仅与国家财政的可计划性高度契合,而且与国家边界高度吻合。事实上,早期的国家空间,大多与谷物的种植空间重合,中华帝国如此,罗马帝国亦然,肥沃新月地区也是这样。这些帝国疆域的边界往往也就是谷物种植的边界。正因为如此,国家疆域的税赋管制“围墙”导致了双向驯化的“农庄效应”:围墙内的农耕国家,相当于一个封闭的农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定居农民驯化谷物、牲畜,从而驯化城墙内的自然生态;国家则驯化农民、农作,从根本上驯化整个社会生态。与之对应,反向驯化程序也就随之而来,即被驯化的植物动物通过国家的“征税偏好”反作用于人类社会,从而导致人类社会适用于这些被驯化的动植物,由此走向“双向驯化”的历史进程。

Nunn and Puga(2012)的研究表明,在奴隶与殖民贸易盛行的年代,那些崎岖的地域对于抵抗外部掠夺具有自我保护的优势,因为殖民统治者难以在这些地方大肆攫取。相反,Cherniwchan and Moreno – Cruz(2019)发现,16 世纪之后,尽管多种美洲作物被欧洲人引入非洲,但玉米却得到了最为快速的传播。因为玉米所具有的税赋管制性质,能够满足殖民统治者进行“营养产出 – 所需劳力”的权衡,因为在当时可选择的各类粮食作物中,种植玉米所需的劳力是最少的。由此,在 1600 – 1900 年间,玉米引种不仅带来非洲人口密度的上升,而且加剧了殖民者的奴隶贸易扩张。玉米隐含的管制工具性导致了非洲的历史性“劫难”。

不同作物隐含着不同的征税含义。通过成本收益的筛选机制,谷物脱颖而出,并成为早期国家进行组织控制的工具性手段。历史上著名的文明,都建立在谷物生产基础之上,如稷之于古老中国,玉米之于南美洲。“历史纪录中没有以木薯、西谷米、山药、芋头、大蕉、面包果或地瓜立国的国家。”

(Scott, 2017)。Mayshar et al. (2019) 基于谷物与土豆种植的历史研究证明, 政治组织的发展程度与是否种植谷物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在主要作物为谷物的地区, 政治组织多为国家 (state) 或大国 (large state), 而在以土豆或其他植物为主要作物乃至不种植作物的地区, 政治组织的发展程度大多不超过大酋邦 (large chiefdom)。可见, 谷物为政治组织提供了物质保障, 是谷物而不是根茎作物决定了国家的起源与人类早期文明的生成。

(二) 政府管制及其放松路径

政府管制的核心目标是要通过对社会经济主体施加限制和约束, 为市场运行及行为主体建立相应的规则。但众多经济学家强调, 政府管制并不必然有利于公众利益, 往往需要付出很高的实施成本与效率损失。一方面, 政府对资源产权与经济行为的宏观管制易于引发资源配置和权利分配的扭曲, 诱致权力集团寻租和院外集团游说所导致的效率与公平损伤; 另一方面, 国家管制实际上将分散决策的权力集中于政府, 从而因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内生出高昂的交易成本。事实上, 政府管制不仅改变了产权结构, 还引起经济当事人常常不能预见的复杂经济后果, 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及整体福利水平 (Alston et al., 1996)。因此, 管制放松的本质是产权结构的重新调整, 是一个租金耗散不断减少的过程, 也是最小化交易成本的理性选择结果 (Barzel, 1989)。所以, 政府管制强化抑或放松, 遵循着成本收益的核算逻辑。当然, 如果政府集团存在特殊的目标偏好或者能够在管制中获得特殊利益, 管制放松亦是可逆的。

“社会风险论”认为, 维护社会安定与政权稳定是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 但由于国家行政指令与基层诉求并不总是相一致的, 从而决定了基层单位往往会基于自身利益而实施管制逃避行为。管制者如若发现管制背后的潜在收益, 将产生管制与逃避管制的博弈局面直至达成博弈均衡。一个基本事实是, 管制逃避的行为将加剧政府管制的监督成本和组织成本 (斯皮格尔、张明, 2012), 国家自上而下的管制也将面临很高的治理风险。由此, 国家在一定的范围内会通过对基层行为的“默许”, 放松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利从而形成政府与民众事务处理之间的“润滑剂”, 以实现国家治理成本的最小化。社会风险论的观点表达了政府管制放松源于化解社会风险的被动选择。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 在制度竞争的压力之下, 通过边缘制度的创新改善效率, 能够坚持和维护核心制度的稳定性 (曹正汉、罗必良, 2003)。一种特别的情形是, 一旦被管制者选择并实施逃避管制的策略, 而管制者不仅因过高的监督成本及实施成本, 更是因为管制的不可实施而难以抑制其逃避行为时, 那么管制者将不得不放松管制。所以, 这类被动的管制放松具有不可逆性。可见, 前述的“国家理论”与本节讨论的管制放松路径具有对应性。

(三) 逃避策略、被动管制放松与市场化发育

在农耕社会, 统治者能够采取的切实有效的管制措施主要是监督作物种植及其产出物, 因为以实物形式征收农业税赋是历史上众多国家维护统治的核心手段 (Carneiro, 1970)。但是, 谷物仅仅是作物种植的一部分。不同的作物, 对国家治理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一是作物分类的“政治”标准。Scott (2017) 按照“政治”标准将作物分类为“集权主义作物”和“无政府主义作物”。谷物作为“集权主义作物”源于其无可比拟的优势 (Mann, 1986)。第一, 谷物的生长情况能够直接观测, 有助于据此调整征税时间; 第二, 谷物果实便于分割、计量和评估, 便于征税官进行监督并准确调整赋税额度; 第三, 谷物生长具有“有限生长”的特点, 且成熟时间集中, 时序一致, 便于征税者一次性征收完毕; 第四, 其收获物便于运输和储存, 征税成本低。正是这些天然的

比较优势,使得谷物被赋予了不可替代的政治工具含义。即便是现代社会,谷物种植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与经济社会稳定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政治作用”。

与之不同,根茎类的马铃薯、树薯等则可视作“无政府主义作物”。薯类作物因耐旱、耐瘠,生长期短,适应性强,产量高,许多农民将其作为常规作物种植失败的补种品种。然而,这类“杂粮”作物并非总是统治者所喜闻乐见的。因为它既不利于产量监督,也不便于运输储存,隐含着作为税收单位的高昂征收成本(Scott,2017)。例如木薯块茎,长于地下,无需过多人力且易于隐藏,成熟期近一年,允许地底藏匿的时间长,而收获相对费力且运输不便。事实上,除粮食作物之外,众多经济作物由于生长时序不一致、储运成本高也无法获得统治者的青睐,例如豆类,尽管像谷物一样便于分割和储存,但却种类多样异质性强,而且亦无固定的收获时间节点(大豆从豆芽、鲜荚到干豆均可食用)。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由于无法提供一次性的收获,显然这些作物也不是统治者和税吏首选的限定作物。因此,如果说谷物是政府管制的工具性手段,那么非谷物尤其是根茎类作物的种植则是逃避管制的重要策略。

二是被动管制放松与市场化发育。一般来说,管制放松能够促进市场化发育,但不同的管制放松逻辑将导致市场化发育的不同路径。如前所述,政府管制的主动放松,是其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具有相机选择的策略性特征,从而意味着管制强化与放松的可逆性,由此带来的预期不确定性并不利于市场化发育。与之不同,由管制逃避策略所决定的政府管制被动放松,不仅仅是政府管制成本核算的结果,更是因为管制的不可实施性所决定的,从而市场化进程是不可逆的,能够表达市场化的内生逻辑。重要的是,管制的被动放松并不具有全局性与同质性,因为不同区域的被管制者由于自身禀赋、选择空间不同,给管制者带来的影响也不一样。可以认为,“集权主义作物”和“无政府主义作物”表达了国家管制与逃避管制的工具性意义,决定着管制放松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从而导致市场化发育不同的生成逻辑。通过“集权主义作物”的行政命令,国家将强化对地方经济自主权与事权的管制,导致基层经济主体无法获得充分的剩余控制权,从而抑制市场化。而作为逃避管制的“无政府主义作物”,则能够带来不可逆的管制放松并诱发市场化发育。可以认为,“无政府主义”作物有着重要的逃离管制的“经济自由主义”基因。

应该强调,尽管管制逃避造成了政府事实上的管制放松,但不应突破政府管制的目标底线,即不能干扰国家宏观方略与危害国家安全。尤为重要,“无政府主义作物”的种植并不存在无限的选择空间,而是与地域环境紧密关联。地理生态与资源禀赋、作物种植及经验积累,尤其是商业文化沉淀的不同,不仅决定了“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与管制逃避策略选择的区域性差异,而且导致了被动管制放松的可能性程度及由此所决定的市场化发育的区域性差异。

(四) 中国情境:作物种植的区域差异及其推论

2006年中国彻底废除了农业税。但并不意味着谷物作为“集权主义作物”的政治属性的消失。我国一直将保障粮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此,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划定18亿亩耕地的保障红线、严格控制不同功能区土地的使用、对建设用地指标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强化粮食生产的主体责任,以及国家通过农业补贴、最低收购价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既然谷物种植仍具有政府管制的含义,那么,基于作物性质解释市场化发育差异进而解释南北经济发展差异将是一个可能的研究策略。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没有一个被人民广泛拥护且控制力较强的政治组织,自然无法对国家进行行之有效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本文将当时各省份的农作物种植视为一种近似无政府情形下的自然分布状态。根据前文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省份谷物种植的变化幅度是政府管制的结果,而管制又可以表达市场化的程度。利用1947年的谷物种植数据(许道夫,1983)作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基期数据,以2016年作为观测时间,对此阶段的谷物种植比重变化与市场化发育程度进行观测。图1表明,1947-2016年,谷物种植比重增幅越大的区域,其市场化发育程度越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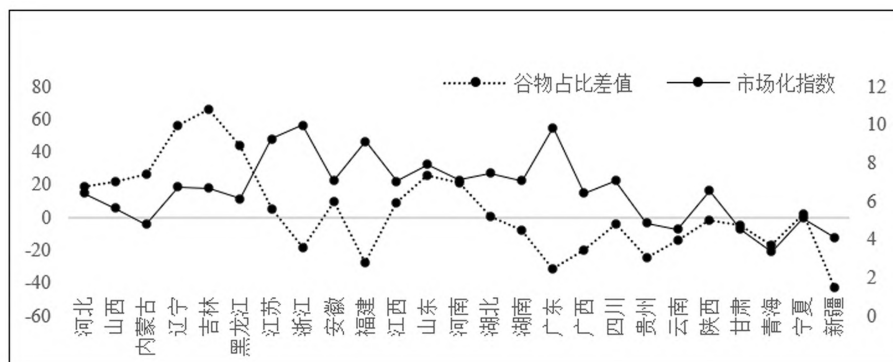


图1 1947-2016年谷物种植比重变化与市场化发育

注:(1)2016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7)。(2)1947年数据来源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许道夫,1983)。数据较为完整的省份有25个。其中,北方13省包括晋、冀、鲁、豫、蒙、黑、吉、辽、新、宁、青、甘和陕,南方12省包括皖、苏、浙、湘、鄂、赣、闽、粤、桂、川、滇和黔。(3)“集权主义作物”包括水稻、小麦和玉米;“无政府主义作物”则包括豆类、薯类、油料、麻类、棉花、糖料、烟叶、蔬菜等。

基于上述,本文提出的基本命题是:市场化发育过程可视为政府管制放松的过程,而根据政治属性可将农作物细分为“集权主义作物”和“无政府主义作物”,且分别表达着管制和逃避管制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不仅如此,作物的政治属性对中国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具有重要解释力。文章的核心推论是,作物性质及其布局差异,不仅形成了逃避策略选择的区域差异,而且导致了市场化发育的区域差异,从而成为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根源。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于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1997-2016)(樊纲等,2010;王小鲁等,2019)。鉴于该指数的编制标准在2008年做了部分调整,为保证数据口径的一致性,本研究将分为两个时段进行实证。一是在讨论市场化区域差异机理时,以樊纲等(2010)的数据为准(1997-2007年);二是在讨论经济增长区域差异根源时则以王小鲁等(2019)的数据为准(2008-2016年)。其他数据则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等官方数据。在此基础上分别构成1997-2007年、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不含港澳台地区)。

(二) 变量设置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市场化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 年报告》(樊纲等,2010)。该指数对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行定期测度,力图真实地反映各地区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的进展。考虑到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变化,所以在指标体系上存在部分调整,但不影响各年度指数的可比性。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政府管制。我国的三大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是典型的不可替代的“集权主义”谷物,能够表达政府管制的程度,因此本文选用两个代理变量进行刻画。一是“谷物面积省内占比”,即各省农作物播种面积中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的占比。二是“谷物面积全国占比”,即在全国谷物总播种面积中各省的占比。其表达的含义是,两类指标的占比越高,表明该省区面临的管制程度越强,反之则意味着管制的被动放松程度提升。

3. 主要控制变量

本文对可能影响市场化的各类因素进行控制。主要包括:(1)气温与降雨。采用各省中心城市年均气温及降雨量进行测度。(2)耕地面积。耕地面积能够表达区域内的人地关系。一般来说,人地关系紧张的区域,往往会倒逼非农就业及非农产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市场化水平。(3)总人口数与农业人口占比。由此控制各省区粮食需求情况以及城乡人口结构。(4)平均受教育水平。引入该变量是为了控制人力资本对市场发育的影响。(5)人均 GDP。人均 GDP 可以控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6)第二产业占比和第三产业占比。由此控制地区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7)作物种植适宜度。采用徐新良等(2017)估算的中国农田生产潜力数据来测度作物种植适宜度。由于该数据是以栅格为单位,为此本文利用 ArcGIS 工具做进一步处理以求得各省区作物种植适宜度的平均值。(8)海拔和坡度。区域的地形地理特征能够影响土地使用,进而影响市场化程度。采用各省平均海拔和平均坡度来表达地形地理特征。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提供的高程数据,并利用 ArcGIS 工具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各省海拔与坡度的平均值。(9)各省省会距离大型港口的距离。用以测度经济开放度以及对市场发育的影响,通过谷歌地图中的“距离测量工具”测算各省政府到最近港口的距离(包括宁波舟山港、上海港、广州港、青岛港、天津港、大连港、烟台港、日照港、营口港、湛江港以及福州港和海口港)。主要变量名称、定义以及统计描述见表1。

(三) 实证策略与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的实证模型包括两个:一是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该模型既可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降低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还可以控制随时间而不随省份变化的效应,即全国性的冲击。二是随机效应模型。当关键解释变量以及某些控制变量不随时间而变化时,双向固定效应无法进行估计,此时利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则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本文采用的宏观数据为面板数据,在基准模型部分,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通过此模型来估计谷物种植比重对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及统计描述

变量	定义/单位	均值	标准差
市场化指数	樊纲等(2010)测算的市场化指数(取对数)	1.605	0.437
谷物面积省内占比	本省谷物占本省农作物播种面积比(%)	54.296	10.731
谷物面积全国占比	本省谷物占全国谷物总播种面积比(%)	3.226	2.358
气温	一省平均气温(摄氏度,取对数)	2.602	0.402
降雨	一省平均降雨(毫米,取对数)	6.575	0.633
总人口	各省总人口(万人,取对数)	8.022	0.889
农业人口占比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67.663	15.927
耕地面积	省级耕地总面积(千公顷,取对数)	7.715	1.049
教育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取对数)	1.987	0.211
人均 GDP	人均 GDP(元,取对数)	9.171	0.657
第二产业占比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42.772	8.419
第三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40.955	7.357
种植适宜度	作物种植适宜度(取对数)	7.275	1.349
海拔	省平均海拔(米,取对数)	6.011	1.582
坡度	省平均坡度(度,取对数)	0.967	1.120
港口距离	与港口的距离(公里,取对数)	5.954	1.317

$$Y_{it} = \alpha_0 + \alpha_1 X_{it} + \alpha_2 D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 μ_i 是省份固定效应, λ_t 是年度固定效应。 ε_{it} 是随机扰动项。 X_{it} 是方程的核心解释变量, D_{it} 为控制变量。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作物种植适宜度、平均海拔、平均坡度、距最近港口距离四个变量是各个省份的个体固定因素, 故只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进行估计。

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无法估计不随时间而变的变量的影响, 而本文使用的个别变量以个体固定效应存在, 因而引入随机效应模型。具体模型为:

$$Y_{it} = \alpha_0 + \alpha_1 X_{it} + \alpha_2 D_{it} + \mu_i + \lambda 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中变量含义同式(1)。另外, 时间趋势项是从“1997 年 = 1”开始依次赋值。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模型分析

表 2 报告了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对市场化指数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 在省区层面“集权主义作物”的种植比重越大, 越抑制其市场化的发育水平。第(1)、(3)列是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通过豪斯曼等检验确定为最优模型。其中, 谷物面积省内占比的系数为 -0.012 , 在 1% 水平上显著。第(2)、(4)列报告了随机效应模型结果, 两个关键解释变量均呈显著负相关。总体而言, 谷物种植强度表达的政府管制对市场化发育呈现出显著负向影响, 与理论分析一致。

要强调的是, 第(3)列的结果表明, 就省区层面来说, 降低谷物种植占比以提升市场化发育程度, 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减少谷物播种面积而危及国家粮食安全, 相反, 在保障粮食种植的前提下, 扩大复耕土地面积、增加非谷物类作物播种面积或复种指数, 既有助于降低谷物面积省内占比又不会影响全国的谷物分布, 又能够有效实现市场化发育与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兼容。

表 2 谷物种植对市场化指数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谷物面积省内占比	-0.012 *** (0.004)	-0.007 *** (0.002)		
谷物面积全国占比			-0.053 (0.036)	-0.046 *** (0.012)
气温	0.351 (0.274)	0.102 (0.104)	0.343 (0.290)	0.026 (0.080)
降雨	0.020 (0.025)	0.007 (0.028)	0.022 (0.025)	0.013 (0.026)
总人口	-0.602 (1.034)	-2.821 ** (1.265)	-0.807 (1.201)	-2.787 ** (1.307)
农业人口占比	0.008 ** (0.004)	0.003 (0.002)	0.011 ** (0.005)	0.005 ** (0.002)
耕地面积	1.700 (1.070)	2.932 ** (1.262)	2.172 * (1.267)	3.021 ** (1.317)
教育	0.322 (0.431)	0.132 * (0.074)	0.374 (0.511)	0.164 * (0.088)
人均 GDP	-0.142 (0.181)	0.363 *** (0.073)	-0.127 (0.189)	0.308 *** (0.078)
第二产业占比	0.022 (0.016)	0.006 (0.006)	0.018 (0.016)	0.002 (0.006)
第三产业占比	0.013 (0.017)	0.000 (0.006)	0.014 (0.018)	0.000 (0.006)
种植适宜度		0.103 *** (0.024)		0.108 *** (0.030)
海拔		0.022 (0.051)		0.048 (0.055)
坡度		0.033 (0.049)		-0.025 (0.050)
港口距离		-0.069 *** (0.024)		-0.083 *** (0.026)
常数项	-8.528 * (4.555)	-2.748 ** (1.215)	-11.290 * (5.836)	-3.417 ** (1.269)
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36	336	336	336
R ²	0.812		0.792	

注：*** p<0.01，** p<0.05，* p<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二) 稳健性检验 1：基于历史数据的估计

历史上作物种植分布所形成的耕作文化遗产,可能会对当前的市场化发育产生影响。为了进一步从历史事实中捕捉谷物种植和市场化之间逻辑关联的经验证据,本节采用历史数据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进行重新估计。第一,使用 1947 年各省份作物播种面积数据计算出的谷物面积省内占比(许道夫,1983)。第二,使用 1997-2007 年历年谷物比重与 1947 年谷物比重的差值作为解释变量,来表达管制强化的程度。回归结果如表 3。其中,第(1)列表明,建国前谷物播种面积的比重显著负向影响市场化发育程度。第(2)列结果表明,谷物播种面积占比的增幅越大,所表达的管制强度越大,将越发抑制市场化发育水平。

表 3 历史数据对市场化指数的影响

变量	(1)	(2)
1947 年谷物比重	-0.002 ** (0.001)	
谷物比重的变化幅度		-0.008 *** (0.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趋势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常数项	-1.016 (1.398)	-9.478 ** (4.345)
观测值	274	274
R ²		0.888

注：*** p<0.01，** p<0.05，* p<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三) 稳健性检验 2: 利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

考虑到谷物种植与市场化发育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节引入村落规模作为工具变量进行重新估计。其合理性在于:首先,村落规模与作物种植具有相关性。定居农业中的聚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由作物的耕作方式所决定。其中,谷物种植农艺的相对标准化与时序一致性,使得农地与农家在空间上具有可分离性,由此形成的居住方式具有“抱团”与聚集性,从而使得村落规模相对较大;而作物种植的多样性及其所要求现场处理的及时性,往往会要求农地与农家的紧密结合,从而导致村落的分散与小规模化(金其铭,1989)。其次,村落规模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历史性,是农业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人与自然长期互动演化的结果,因而对现期的市场化发育具有一定的外生性,从而满足工具变量的选择标准。本文村庄规模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聚落地理》(金其铭,1989)和《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鲁西奇,2014),数据采集年份集中于 1980 年前后。表 4 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表明,村落规模显著提高省域范围内的谷物种植占比,满足相关性要求;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谷物面积占比的提高将显著抑制其市场化水平。

表 4 利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一阶段估计结果	二阶段估计结果
	谷物面积省内占比	市场化指数
村落规模	6.975 *** (1.450)	
谷物面积省内占比		-0.016 *** (0.0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36	336
F 值	32.152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四) 稳健性检验 3: 基于区域划分的再估计

逻辑上而言,谷物种植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不仅仅表现在全国层面,在地域层面也应该具有类似的因果关系。基于此,本节进一步做分区比较。一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等部门 2004 年联合下发的《关于 2004 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和在部分粮食主产区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划分标准,将我国省份划分为粮食主产区(13 个省份)和非粮食主产区(18 个省份);二是根据前文的界定,将各省份划分为南方和北方产区。

表 5 的估计结果显示:(1)无论是按照粮食主产区划分还是按照南北省份划分,“集权主义”作物种植都能够显著抑制市场化发育;(2)每降低一单位的谷物面积省内占比,非粮食主产区或南方产区,所获得的市场化提升空间要大于粮食主产区或北方产区;(3)通过引入是否粮食主产区或南北分区(0-1 赋值)与谷物播种省内占比的交互项进行实证,交互项系数均具有显著性,验证了系数绝对值的统计学差异。

(五) 机制分析:对市场文化的考察

作物种植作为一种农耕文化,如果说宏观上谷物造就政治组织与国家,那么谷物种植的差异性将造就区域的市场文化差异。其一,政府管制提高了创业成本,而管制放松下的人们更具有创业精神(Branstetter et al., 2014)。其二,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所隐含的个体文化特质,更有利于激发创新能力(Bukowski and Rudnicki, 2018)。为此,本文使用人们的择业选择(体制内和体制外)和创新

表 5 谷物种植对市场化指数的影响(区域对比)

变量	粮食主产区	非粮食主产区	南方产区	北方产区
	(1)	(2)	(3)	(4)
谷物面积省内占比	-0.008 ** (0.003)	-0.013 ** (0.005)	-0.019 * (0.009)	-0.007 ** (0.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073 (4.303)	-14.300 (8.624)	-9.826 (7.775)	-13.410 * (7.476)
观测值	142	194	172	164
R ²	0.942	0.789	0.786	0.903

注: *** p<0.01, ** p<0.05, * p<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限于篇幅,交互项的结果并未报告,留存备索。

能力进行机制分析。其中,利用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计算方式为:“1-谷物种植占省内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表达管制放松;利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从业人数占比测度就业的市场化观念;使用地区技术专利受理数和技术专利授权数刻画创新能力。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省级数据。

表 6 的估计结果表明,由无政府主义作物所表达的逃避策略诱发了管制放松,显著促进人们的市场化择业。表 7 的回归结果则表明,无政府主义作物占比的提升,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并促进市场化水平的提高。

表 6 作物种植、择业选择与市场化水平

变量	私营从业人数占比	市场化指数	国营从业人数占比	市场化指数
	(1)	(2)	(3)	(4)
无政府作物省内占比	0.198 ** (0.073)		-0.261 *** (0.063)	
私营从业人数占比		0.011 *** (0.003)		
国营从业人数占比				-0.013 *** (0.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68.000 ** (123.900)	-9.002 * (5.154)	307.400 *** (108.600)	-7.182 (5.469)
观测值	340	336	340	336
R ²	0.810	0.811	0.902	0.813

注: *** p<0.01, ** p<0.05, * p<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五、南北经济增长差异:作物种植的政治经济学意蕴

(一) 南北经济差距的形成机制

1. 无政府主义作物与南北经济差距

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选择的区域差异,是导致南北市场化及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发性根源。地理环境决定了南方“无政府主义作物”的种植更具制度土壤。一是南方山水纵隔的地理形态,使得无政府主义作物的种植难以被监督和管制。二是南方湿热的气候条件使得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可以实现多熟制(翟虎渠,2016),由此所决定的比较经济优势,更易诱发管制的逃避行为。

表 7 作物种植、创新精神与市场化水平

变量	专利受理数	市场化指数	专利授权数	市场化指数
	(1)	(2)	(3)	(4)
无政府作物省内占比	0.010 * (0.005)		0.012 ** (0.006)	
专利受理数		0.205 ** (0.077)		
专利授权数				0.244 *** (0.07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243 (7.962)	-12.260 ** (5.185)	2.335 (8.678)	-13.870 ** (5.326)
观测值	340	336	340	336
R ²	0.868	0.829	0.856	0.835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为验证以上逻辑推论,本节基于 2008 – 2016 年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各省份 GDP 增长率和北方 GDP 增长率的差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在基准模型表 2 基础上增加了可能影响 GDP 增长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一是资产情况,选用固定资产折旧占 GDP 比重进行衡量;二是劳动力情况,增加 15 – 64 岁劳动力占比进行控制;三是经济结构,在原有产业结构基础上增加城镇人口占比、私营企业营收比重进行控制(盛来运等,2018)。

表 8 中第(1)列的估计结果表明,无政府主义作物省内占比对 GDP 增长率呈现显著正效应,表明无政府主义作物占比越大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第(2)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南北方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占比差距越大,越会显著加剧南北经济发展的差距,从而证明了“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所表达的管制逃避对南北经济差距具有重要的解释力。

表 8 作物种植与南北经济差距

变量	GDP 增长率	GDP 增长率差距
	(1)	(2)
无政府主义作物省内占比	0.135 *** (0.047)	
无政府主义作物占比差距		0.199 *** (0.0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3.807 (98.586)	0.145 (3.802)
时间趋势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观测值	279	279
R ²	0.765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2. “南稻北麦”文化差异与南北经济差距

千百年来,“南稻北麦”一直是我国农业种植的基本格局。水稻和小麦两类主粮作物尽管同属于“集权主义作物”,但地理分布与耕作差异所形成的文化沉淀,造就了不同的制度性“基因”与管制环境(Guiso et al., 2016),从而对于南北经济差距具有重要的机理性作用。一方面,北方麦区长期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无论是谷物性质还是地理位置,都使其易于监督和监管;

南方稻区远离政治中心而且隔山隔水,其高昂的监督成本意味着稻区具有较为宽松的管制逃避空间。另一方面,相较于小麦,水稻种植更具劳动力密集型特征,且对于耕作条件、灌溉设施及其分工合作具有较高的要求,从而形成了稻作区集体主义文化(Talhelm et al., 2014)。显然,集体主义中的互帮互助、协同维护所形成的“土围子”,对内有助于个体逃避“集权管制体系”,对外有利于在资源及其控制权的竞争中占优。

(1)微观证据。本节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CLDS),使用村庄层面的作物种植状况来刻画稻麦文化(具体赋值:水稻=1;小麦=0)。考虑到创业开拓精神和契约精神被视为市场化发育的重要特征,因此本文使用CLDS问卷中“是否创业”和“是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两类问项(具体赋值为:是=1,否=0)作为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9的估计结果显示,相比于小麦种植区,稻作区具有更为明显的市场文化品质,从而进一步验证了上文的基本逻辑。

表9 南稻北麦种植文化对市场精神的影响

变量	创业精神		契约精神	
	Probit	OLS	Probit	OLS
稻麦种植文化	0.028 *** (0.009)	0.269 *** (0.096)	0.370 ** (0.184)	1.418 ** (0.62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职业虚拟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10 *** (0.024)	-1.042 *** (0.202)	-0.046 (0.305)	-1.149 (1.032)
观测值	2270	2270	322	312
(伪)R ²	0.026	0.063	0.335	0.278

注:*** p<0.01, ** p<0.05, * p<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2)宏观证据。中国作物的“南稻北麦”格局与耕地类型(水田旱地)的分布相契合。为此,按照前文的南北分区进一步设置耕地类型作为作物种植的代理变量(具体赋值:水田=1;旱地=0)。其中,南方的水田省份为16个,北方的旱地省份为12个(不含内蒙古、青海和宁夏以牧场为主的省份)。表10第(1)列结果显示,相比于旱作区,以水田为主的南方地区具有更高的市场化水平。第(2)(3)列结果表明,以水田为主的省区,更易于实施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的管制逃避,且能够显著提升其市场化水平。因此,中国“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以及南方的管制逃避,是导致南北市场化水平差异的重要诱因,并最终导致南北经济差距。

表10 耕地类型、作物种植与市场化水平

变量	市场化指数	无政府作物省内占比	市场化指数
	(1)	(2)	(3)
耕地类型	0.172 *** (0.057)	13.214 ** (6.141)	
无政府主义作物省内占比			0.007 *** (0.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505 *** (1.223)	-94.630 * (52.040)	-4.461 *** (1.046)
观测值	304	308	304

注:*** p<0.01, ** p<0.05, * p<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二) 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根源

1. 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产权机理

本文的基本逻辑是,由逃避策略与种植文化所决定的市场化发育逻辑,导致了市场化及经济发展的南北差距。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中国南北GDP比重一直维持在较为稳定的状态。为什么随后尤其是2013年之后南北经济总量差距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自古有之,显然不能对此做出回答。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寻求逻辑一致的解释。

两个方面的事实尤其值得重视。第一,我国粮食生产重心不断北移。南方地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从2007年的47822千公顷增加到2013年的50019千公顷,但之后逐步减少至2018年的48670千公顷;相反,北方地区则从2007年的57817千公顷持续增加到2018年的68369千公顷,且从2013年开始加速增长(杨进、刘新宇,2021)。第二,始于2009年开始试点并于2013年在全国推进的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简称“农地确权”),由此所决定的产权安全性与稳定性预期,一方面激励了南方对无政府主义作物的逃离,并不断推进市场化进程,另一方面却突显了北方土地、劳动力及机械化种植的比较优势,从而强化了对政府种粮政策支持的路径依赖。可见,粮食种植重心北移与农地确权政策实施具有内在关联性。农地确权能够为种植结构调整或管制逃避策略的实施,进而为南北经济差距扩大提供机理性洞见。

2. 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实证检验

我国的农地确权是逐次推进的,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开展农地确权并开始小范围的村庄试点,2011年至2013年以乡镇为单位在数百个县进行试点,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用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农地确权工作。其中,2014年农业农村部首先将山东、四川和安徽作为整体试点省份,2015年增加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甘肃、宁夏、吉林、贵州以及河南9个整省试点,在2016年又增加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浙江、广东、海南、云南、山西10个省份开展整省推进。2017年则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本文采取两种方式刻画农地确权。(1)按照省级层面确权进度赋值(简称为“整省确权”),已经推进及完成确权的省份赋值为1,未开展确权的省份赋值为0;(2)农地确权被视为继土地改革、家庭承包之后的第三次农村土地革命。制度变革的重要性势必带来广泛的社会响应,哪怕是最初的村庄试点也会释放出强烈的政策信号。因此,与前述确权进展相对应,可按照试点工作的推进层级与次序进行赋值(称之为“层级确权”),即2009-2010年赋值为0.2(之前赋值为0),2011-2013年赋值为0.5,2014年及之后赋值为1。使用2008-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

表11中第(1)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农地确权政策所诱导的无政府主义作物的布局差异,显著拉大了南北的经济发展差距,第(2)列的估计结果依然支持了这一结论。进一步对比(1)(2)列两个交互项的系数,可以发现,即使是农地确权政策信号的释放,南方也能够比北方做出更为强烈的行为响应并扩大经济差距。

六、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但中国依然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的突出问题,市场化水平与经济区域差距明显,特别是南北经济

表 11 作物种植、农地确权与南北经济差距

变量	GDP 增长率差距	GDP 增长率差距
	(1)	(2)
无政府作物占比差距	0.231 *** (0.017)	0.182 *** (0.014)
整省确权	-0.053 (0.087)	
无政府作物占比差距 × 整省确权	0.018 *** (0.003)	
层级确权		-0.062 (0.201)
无政府作物占比差距 × 层级确权		0.065 *** (0.01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276 (3.647)	0.730 (3.810)
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79	279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差距呈现出不断拉大的态势。本文基于作物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学特性,构建“政府管制 – 作物性质 – 逃避策略”的分析框架,揭示市场化发育及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生成根源,并逻辑一致地解释中国南北差距形成的内在诱因。

(一) 主要结论

由可实施的逃避策略所决定的被动管制放松,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市场化进程,往往具有不可逆性。从而,逃避策略选择的区域差异性,是导致中国南北区域市场化发育进而引发经济增长差距的重要根源。基于全国 1997 – 2007 年、2008 – 2016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1)从省际分区看,表达为“管制”含义的“集权主义作物”(以稻谷、小麦、玉米为代表)的种植面积占比越大,省际层面的市场化水平越低,从而表明,谷物种植所表达的政府管制对市场化发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也验证了“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的逃避策略诱发被动管制放松的逻辑机理。(2)机制分析表明,谷物种植对人们的择业偏好与市场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谷物种植占比越高的省份更偏好于“体制内”就业,创新精神相对偏低,并抑制市场化水平。(3)差异化管制强度与“南稻北麦”种植文化所共同构成的“制度基因”,特别是 2013 年全面实施农地确权的“制度信号”所激发的管制逃避策略的“南强北弱”,是中国南北市场化与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发性根源。

(二) 理论意义

(1)与主流文献对作物的分类标准不同,本文基于作物政治属性维度揭示了政府管制与逃避管制、主动管制放松与被动管制放松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从而丰富了关于管制理论的研究文献;(2)从作物种植的视角探索区域市场化发育、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源,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视角重新审视作物种植的国家管制含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博弈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制度性功能,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机理认识;(3)阐明农耕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农业的种植结构不仅表达了气候、地理等差异,而且能够表达广泛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其中,作物品种的选择隐含着“政治”意蕴,种植文化作为制度遗产对中国市场化发育与南北经济差距具有重要的解释力。

(三) 政策含义

谷物性质及其管制逃离策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蕴。(1)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是政治底线,必须切

实保障国家粮食供给安全。一个基本的策略是,在保障粮食种植的前提下,扩大复耕土地面积、增加非谷物类作物播种面积或复种指数,从而有效实现市场化发育与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兼容。(2) 正确把握政府管制强化与放松的有序调节,宜管则管,宜放则放,不断改善国家宏观调控功能与市场基础性功能的激励相容。尤其是对北方地区来说,放松产业管制,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与对内对外开放力度,推进重化工业价值链的转型升级和新价值链的重构。(3) “南北差距”本质上是实行市场经济主动性、积极性和自觉性的差距。因此,必须改善营商环境,培育市场文化、契约精神与企业家精神,鼓励多样化的创新创业,广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南北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体化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曹正汉、罗必良,2003,“一套低效率制度为什么能够长期生存下来——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公社体制个案”,《经济学家》,第6期,第50-55页。
- 陈富良,2001,《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邓仲良、张可云,2020,“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为何存在?——一个空间经济学的解释”,《经济研究》,第4期,第20-36页。
-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2011,“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第9期,第4-16页。
-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0,《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郭妍、张立光,2018,“我国区域经济的南北分化及其成因”,《山东社会科学》,第11期,第154-159页。
- 金其铭,1989,《中国农村聚落地理》,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 鲁西奇,2014,《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卢现祥、王素素,2021,“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测度、区域差异分解与动态演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南方经济》,第1期,第37-63页。
- 萨莉·斯皮格尔、张明,2012,“怎么规避资本监管以及为什么它们仍能有效”,《国际经济评论》,第5期,第95-105页。
- 钱金保,2020,“后发经济体如何成功开放:从东亚模式到中国道路”,《南方经济》,第4期,第53-61页。
- 盛来运、郑鑫、周平、李拓,2018,“我国经济发展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管理世界》,第9期,第16-24页。
- 孙志燕、侯永志,2019,“对我国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多视角观察和政策应对”,《管理世界》,第8期,第1-8页。
- 王小鲁、樊纲、胡李鹏,2019,《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习近平,2019,“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求是》,第24期,第1-8页。
- 许道夫,1983,《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徐新良、刘洛、蔡红艳,2017,“中国农田生产潜力数据(1970-2010)”,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数据注册与出版系统(<http://www.resdc.cn/DOI:10.12078/2017122301>)。
- 杨进、刘新宇,2021,“中国农业种植结构变化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专业化分工的视角”,《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第4期,第64-73页。
- 杨明洪、巨栋、涂开均,2021,“‘南北差距’: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化的事实、成因与政策响应”,《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4期,第97-112页。
- 翟虎渠,2016,《农业概论(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张曙光、赵农,2000,“市场化及其测度——兼评《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经济研究》,第10期,第73-77页。
- 赵恢林,2019,“人口流动管制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异质性技能视角分析”,《南方经济》,第12期,第118-133页。
- Acemoglu, D. and J. A. 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 Alston, L. J., T. Eggertsson and D. C. North, 1996, “Empirical Studie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zel, Y., 1989,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andt, L. and T. G. Rawski, 2008,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anstetter, L., F. Lima, L. J. Taylor and A. Venâncio, 2014, “Do Entry Regulations Deter Entrepreneurship and Job Creation? Evidence from Recent Reforms in Portugal”, The Economic Journal, 124(577): 805-832.
- Bukowski, A. and S. Rudnicki, 2018, “Not Only Individualism: The Effects of Long-Term Orientation and Other Cultural Variables on National Innovation Success”, Cross-Cultural Research, 53(2): 119-162.

- Carneiro, R. L. , 1970,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Science*, 169(3947) : 733 – 738.
- Cherniwchan, J. and J. Moreno – Cruz, 2019, “Maize and precolonial Afric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36(C) : 137 – 150.
- Guiso, L. ,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2016, “Long Term Persiste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4(6) : 1401 – 1436.
- Lee, B. , J. Peng, G. Li and J. He, 2012,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Financial Disparity and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6(2) : 342 – 358.
- Mann, M. ,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yshar, J. , O. Moav, Z. Neeman and L. Pascali, 2019,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Land Productivity or Appropriability?”, Tel – Aviv University.
- North, D. C. ,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unn, N. and D. Puga, 2012, “Ruggedness: The Blessing of Bad Geography in Afric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4(1) : 20 – 36.
- Scott, J. C. , 2017, “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 C. , 2009,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alhelm, T. , X. Zhang, S. Oishi, C. Shimin, D. Duan, X. Lan and S. Kitayama, 2014, “Large 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344(6184) : 603 – 608.

Marketization, the North – South Gap and its Root Causes: Investig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Based on the Nature of Crop

Cong Shengmei Geng Pengpeng Luo Biliang

Abstrac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ir root causes have alway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c circles. Among them,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ization are important clues to explain the ga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root cause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market development have not been properly explaine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logical framework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 crop nature – evasion strategy”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dimension of crop nature, and explore the determining mechanism of market development behind the gap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if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is regarded as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deregulation, then deregul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active deregulation and passive deregulation. The passive deregulation determined by the implementable evasion strategy and the marketization process triggered by it are often irreversible. As a result, avoid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strategic choices will lead to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regional market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us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1997 to 2016 across the country shows that the regulation evasion strategy expressed by “anarchist” crop planting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ization; the differences in crop planting an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ing contained in them, Together, they determin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marketization; originating from the full – scale implementation of farmland right confirmation in 2013, it has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evasion of control of “strong South and weak North”, resulting in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economic disparity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his research not only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differences i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lleviating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Keywords: Government Regulation; Crop Nature; Evasion Strategy; Marketization; North – South Economic Gap.

(责任编辑:钱金保)